

第18卷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1937—1943.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译】

 中共党史出版社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1937—1943.5）

第18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译】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联共 (布) 、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1937—1943. 第 18—21 卷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
究部编译. --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1

(共产国际、联共 (布) 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ISBN 978-7-5098-5246-0

I . ①联… II . ①中… III . ①苏联共产党 (布尔什维
克) — 关系 — 中国共产党 — 抗日战争 — 史料 — 1937—1943 ②
共产国际 — 关系 — 中国共产党 — 抗日战争 — 史料 — 1937—
1943 IV . ① K265.106 ② D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57625 号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协调编辑：吴江

责任编辑：李亚平

复 审：吴江

终 审：汪晓军

责任校对：申宁

责任印制：谷智宇

责任监制：贺冬英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170mm × 240mm 1/16

字 数：2170 千字

印 张：152.5

印 数：1—3050 册

版 次：202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5246-0

定 价：365.00 元 (全四卷)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010-82517197

丛书编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主 编 黄修荣

副主编 马贵凡 霍海丹 刘宋斌

学术指导

李 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廖盖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向 青(北京大学 教授)

杨云若(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刘桂生(北京大学 教授)

张注洪(北京大学 教授)

宋洪训(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 研究员)

A. M. 格里戈里耶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教授)

K. B. 舍维廖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V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ПК
В ПЕРИОД АНТИ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1937 — май 1943

РЕДАКЦИОННАЯ КОЛЛЕГИЯ:

М. Л. ТИТАРЕНКО, М. ЛЕЙТНЕР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работы),
К. М. АНДЕРСОН, А. М. ГРИГОРЬЕВ, А. И. КАРТУНОВА,
И. КРЮГЕР, Н. И. МЕЛЬНИКОВА,
К. В. ШЕВЕЛЁВ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7

编辑说明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共21卷,分别于1997年、2002年和2012年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6卷)和中共党史出版社(9卷)出版。作为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档案资料,丛书出版以来受到读者的高度关注,特别是被史学研究者广泛引用。考虑到丛书出版年代已较为久远,且分散于三家出版单位,如今读者购买和使用有所不便,我们与编译者商定对整套丛书进行修订再版。

为了方便史学研究者引用,同时使丛书保持一定延续性,这次修订再版,我们未对各分卷卷次、署名方式等做改动,但依据历史分期,将丛书整合为三辑,即“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17—1927)”(第1—6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7)”(第7—17卷)和“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第18—21卷)。

为保持档案资料原貌,这次修订再版,档案文献内容几乎不做改动,主要是对图书的封面、版式和开本做了调整;删除了原分卷中的“勘误表”,将其中的错误直接做了纠正;修改了个别人名译法;对个别注释的格式做了改动并校订了其中的史实差错;对发现的错别字做了订正。

当然,本次修订再版后书中的疏漏和不当之处仍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9年6月

丛书前言

联共(布)^①、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等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广大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开动脑筋、积极探索,在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研究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而推动了中共党史等有关学科的研究,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但由于所能看到的档案资料还比较匮乏等原因,这些研究只是初步的,有待进一步深入。因此,积极开发利用各种文献档案,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俄国政治体制的变革,俄罗斯国家档案管理机构和管理办法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从1993年开始实行《关于俄罗斯联邦档案馆馆藏及档案馆库管理的基本法》。随着这一法规的颁布,大量罕见的档案资料首次开放并陆续出版。其中最使我国学术界感兴趣的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联合编辑的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大型系列档案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3)》。

为了把这批从未公布过的重要档案资料介绍给我国史学界和广大读者,我们根据与俄方签订的协议,组织有经验的学者独家翻译这套档案文件集,

① 苏联共产党的名称有一个变化的过程: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成立;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12月,党的十四大决定将俄共(布)改称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又决定将联共(布)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并聘请中外专家进行译审、校阅。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历年来在我国各种报刊、杂志、图书上发表的其他重要中文文献资料编成多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43）》。这套文献资料选辑将与前述档案文件集组成《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陆续在我国出版。

毋庸置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是一套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档案资料。它的问世,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重点、目标及其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脉络,而且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各军事、政治集团和重要人物的态度和策略,更具体地弄清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苏联驻华使节及顾问在华活动情况以及他们之间的共识和分歧,从而进一步深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以及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

这套档案资料丛书在编译、出版过程中得到多方帮助。值此丛书问世之际,谨向关怀、支持过这项工作的有关领导和部门,向为编译、出版这套丛书辛勤工作的专家学者及出版社的有关同志,致以深切的谢意。

黄修荣

2012年2月

于京北宝盛里

译者前言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两册)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编辑的大型系列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第5卷(即最后一卷)的中译本,根据莫斯科2007年俄文版译出。本卷文件集收录自1937年8月(抗日战争爆发后)至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期间有关档案文件及在时间上超出这一时期但在内容上与其有密切联系的档案文件共300份,绝大部分为首次发表。其中有任弼时于1938年5月17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所作的《中国的抗战形势及中共的工作和任务》的报告,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首次派出代表向共产国际直接详细汇报中共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活动情况、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和党所面临的任务。还有周恩来于1939年12月29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的一份关于中国问题的书面报告,阐述了当年统一战线的状况和特点、国共两党的关系和各自的政策以及群众运动的状况等。同时卷中也发表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就这两个报告分别作出的决议,对中共实行的政治路线作出了评价,并对中共以后的工作提出了指导意见。此外还有些文件记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人员与中共代表一起就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坚持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以及中共在统一战线各个发展阶段的政策问题所进行的探讨,主要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研究中国问题小组的会议记录。引人注目的是,本卷发表的文件多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和季米特洛夫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之间往来的电报,特别是自1940年10月下旬至1941年4月间围绕国共两党

之间军事冲突的增多、皖南事变的发生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严重的破裂危险往来的电报。从中可以看出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在中共处理皖南事变问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还有些文件反映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在抗日战争时期向中共提供财政援助,在新疆帮助中共创办军校培训军事技术干部,在督办盛世才改变对共产党人态度后帮助中共解救驻新疆工作人员等的情况。也有些文件涉及中共党内状况、延安整风、王明与中央领导之间矛盾等问题,反映了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对某些问题的不同看法。本卷最后集中发表了有关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以及中共和中国其他党派对此提议作出的反应的文件。

这些文件都具有很高的文献和学术研究参考价值,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特别是更具体地研究这一时期国共关系的演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维持和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为了及时将本卷译介给我国史学界,我们于2007年向原书编者购买了中文版翻译出版权,并于2008年上半年开始组织力量进行翻译。本卷中译本(两册)列为我们编译的大型文献档案丛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第18、19卷。

本书俄文版由前言、文件正文、图书目录、人名索引四部分组成,中译本全文译出前两部分和第四部分(放在第19卷末),第三部分从略。为反映文件原貌,本卷中译本仍保持了原文件体例,未做任何删节。在俄文版中注释是文尾注和脚注,为便于读者阅读,中译本一律改为脚注。有些注释对中国读者来说实无必要,翻译时作了删节。译者新加的注释在注后标有“译者”字样。

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很大难题,是准确还原中国人的本名,文件中有些中国人使用的是化名或方言拼音姓名,由于年代较久,又缺乏可参考的中文资料,有些人的名字难以查实,只好音译或估译,这种情况在行文中或脚注中作了说明。

文件中有些俄国人的名和父名缩写字母,因不知全称,无法译出相应汉字,为统一起见,在中译本正文中一律删去不译,只译姓,但在注释中则注明

其名和父名的缩写字母。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得到许多知名学者的关心和帮助。著名汉学家、原书俄方编者、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A.M. 格里戈里耶夫教授、A.И. 卡尔图诺娃教授, 以及 Н.И. 梅利尼科娃、И.Н. 索特尼科娃高级研究员热情地帮助我们解决语言理解等方面的一些疑难问题; 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张注洪教授、刘桂生教授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审读译稿, 帮助订正译文中的不准确之处。在此我们特向他们表示谢意。

本书翻译工作由马贵凡同志组织。

参加翻译的有:(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贵凡(中央党史研究室译审);

王昌滨(中央党校译审);

宋洪训(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董友忱(中央党校译审)。

全书译稿最后由宋洪训、马贵凡同志校定。

由于时间仓促, 水平所限, 译文中难免有错漏和不妥之处, 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前 言

本第五卷是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为总名称的系列文件集^①的最后一卷,本卷所收录的文件,阐明了从1937年8月至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这一时期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本卷还以附录形式收录了虽然在时间上超出这一历史时期但在内容上与其有密切联系的6个文件。近几十年来,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开放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档案以后,出现了一系列文件集和著述,其中完整地或部分地引用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件,反映了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本文件集编者还决定将一些已经发表的文件收录其中,试图提供全面的历史情景,也是考虑到许多文件是在不同国家用不同文字发表的^②。

① 见第1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莫斯科1994年版,季塔连科、郭恒钰主编;第2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莫斯科1996年版(两册),季塔连科、莱特奈尔主编;第3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莫斯科1999年版(两册),季塔连科、莱特奈尔主编;第4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莫斯科2003年版(两册),季塔连科、莱特奈尔主编。

② 见《季米特洛夫日记(1933年3月9日—1949年2月6日)》,索菲亚1997年版;《共产国际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册(1941年6月22日以前),H. C. 列别捷娃、M. M. 纳林斯基编,莫斯科1994年版;同上第2册(1941年6月22日以后),H. C. 列别捷娃、M. M. 纳林斯基编,莫斯科1998年版;《俄共(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1919—1943)》文件集,Г. М. 阿基别科夫、K. M. 安德尔松、K. K. 希里尼亚编,莫斯科2004年版;《季米特洛夫与斯大林(1934—1943)——来自苏联档案中的信函》,亚历山大·达林和F. I. 菲尔索夫编,纽黑文和伦敦2000年版。

这一时期共产国际的主要文件表明,共产国际活动的主要内容,是与中共代表们^①一起,制定国共两党在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各阶段进行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和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即使在国共关系出现危机的情况下,共产国际也在争取使这一合作不致遭到破坏。

本卷收录的新的档案文件,特别广泛地展示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同中共之间,以及季米特洛夫同毛泽东之间的密电往来,其中含有许多新的东西。

在中国抗日战争过程中争取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题目在史学界,特别是在中国史学界阐述得相当广泛。从20世纪80—90年代起,开始出版一些利用以往鲜为人知的文献的著述^②。

收入本卷文件的特点之一是,其中不含有共产国际对统一战线这个主要问题的争论内容。这些争论只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些会议上就策略问题发生过,对此本卷编者只是从中国论述中共党史的著作中得知的,而我们对中共党史也不十分熟悉。

自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年)以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除了通过有关给共产国际活动拨款、开展国际反法西斯运动和其他一些非常事件的决议之外,再没有就共产国际政策问题通过决议。通过重大决议的全权正式属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和书记处。然而在实践中,每个重要决议都是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或者斯大林协商的^③。共产国际执委会支持克里姆林宫的一切内外政治举措,这一点也反映在共产国际就中国问题所通过的决议中。这

① 1937年10月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王明、王稼祥和康生)回国后,在1938至1940年间,周恩来和任弼时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他们回国后,中共代表空缺。1942年Л.Л.弗拉基米罗夫(弗拉索夫)作为共产国际的联络员被从苏联派往延安。在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以后,南方局工作人员就直接与苏联驻重庆大使馆人员,必要时与大使以及苏联军事顾问就迫切问题交换意见。

② 例如《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北京2002年版,第1卷第1—2册;栾景河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北京2004年版;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1999年版;《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1997年版;郭德宏、刘晶芳等编:《中国共产党的历程》,海南2001年版,第1卷。

③ 《俄共(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文件集(1919—1943)》,第15页。

一点尤其可以从季米特洛夫的日记中和他给斯大林的信中清楚地看出^①。

中日战争中的主要事件在国内外的著述中已有详尽的阐述。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开始,日本人提出了实际控制华北广大地区的要求,7月30日和31日,日本军队占领了北平(北京)和天津,9月和12月占领了上海和南京,1938年10月又占领了广州和武汉。至此结束了战争的第一阶段,常规战线长期稳定下来。战争进入持久阶段。

为不使大部分部队“困住”在中国,而使其解脱出来去实现“向北”(反对苏联)或“向南”(占领印度支那)的侵略计划,日本领导人不止一次地向中国政府提出“和平解决冲突”的建议。同时一直在最后通牒式地要求中国政府投降,保持日本对华北地区的控制,日本、中国和满洲国实行经济“合作”,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随着中国在战场上所面临的形势的恶化,这些“和平建议”加强了国民党内及其军队部分领导人中的动摇心理,他们认为抗日是没有前途的。

在国民党领导层内部,有以汪精卫为首的公开亲日派,积极支持日本的要求,把这些要求称为“体面媾和”的建议。

1939年9月1日法西斯德国进攻波兰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然后,随着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1941年至1945年苏联人民伟大卫国战争的开始,以及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国际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这一点既反映在中国的内部政治局势上,国民党对中共态度的动摇上,也反映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考虑到新的紧急情况而对中国工作重心的变化上。

在我国的著述中,详尽而系统地探讨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自共产国际七大以来新的政治方针的演变,也探讨了国共两党代表在1937年上半年就两党合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进行接触的简要经过^②。

① 《俄共(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文件集(1919—1943)》,第15页。

② 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第4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2册,第868—896页。

在战争的最初日子里，中国共产党就号召组织全民抵抗日本侵略。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在告全国同胞书中号召全国人民、政府、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①，抵抗日寇的侵略。

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交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其中阐述了以下目的：（1）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动员人民进行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恢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2）建立民权基础上的制度，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和规定救国方针；（3）保障人民稳定的财产收入，发展国防经济。

宣言中又一次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为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的政策，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改组特区的政府和实行民权政治；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统辖并待命出动。^②然而蒋介石只是在两个多月后才允许发表这个宣言，并发表自己的声明。

1937年6月开始后又中断的中共代表团与蒋介石在庐山的会谈于7月恢复。7月17日原则上达成了协议，陕甘宁边区政府改组为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的特区政府，以及中国红军改编为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民族武装力量八路军。

1937年8月10日召开的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对于确定中共因中国军事政治形势变化而提出的任务是十分重要的。

季米特洛夫在会上发言（第1号文件），说王明的报告是“有点鼓动性的”。季米特洛夫特别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要急剧转变中共干部的思想意识。要完成这项任务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中共干部在十年内战期间受到的是苏维埃思想教育，一直把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军队当作主要敌人来与之对抗。

①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1991年版，第11册，第274—275页。

② 宣言的全文见《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1980年版，第76—78页。

根据这一方针,此时需要在党的政策上、党的策略上作出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正是这些干部,不是另一个党,不是另一些新人,而正是这些党员,这些群众必须实行另一种政策。季米特洛夫为中国提出了新的政治方针,现在不是搞苏维埃化,而是使中国人民免遭日本帝国主义的“吞食”。中共的任务就是争取民主化,争取在民主基础上使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联合起来反对日本侵略。季米特洛夫说,这一政策是正确的,是同共产国际七大的总路线一致的,也是符合中国革命的发展的。

与此同时,季米特洛夫还表示担忧,这些干部能否顺利地执行新的政策。必须培养新的干部,新老干部都必须学习,避免党和党的干部因实行新的政策而在思想上解除武装。

苏联的对华政策在推动蒋介石采取进一步实际步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以及在激励他下决心抗击日本侵略上起了重要的作用。1937年8月21日,在南京签署了苏联和中华民国互不侵犯条约^①。这一条约的签订便于苏联向中国提供援助。1937年9月14日,作为这一条约的补充,双方就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技术、弹药和军人装备而其费用由向中国提供的贷款支付(第一次贷款5000万元)达成了协议。同时特别附带说明,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的武器援助应由南京政府拨给共产党军队^②。

中国从苏联得到了按当时来说十分可观的贷款(1938至1939年为2.5亿美元,总共为4.5亿美元)和武器装备(战争头几年为24个师的装备)^③。此外,苏联军事顾问(至1939年年中,在中国工作的有3665人之多^④)和空军志愿飞行员也给中国军队提供了援助^⑤。

① 条约全文见《苏中关系文件集(1917—1957)》,莫斯科1959年版,第161—162页。

② 《中国近代史(1928—1949)》,莫斯科1984年版,第149页。

③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1937—1945)》,莫斯科1988年版,第17页。

④ 《中国现代史(1928—1949)》,第190页。

⑤ 关于苏联对华援助和苏联顾问的活动,详见《苏联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中的军事援助》,莫斯科1975年版,第49页;B. A. 鲍罗廷:《苏联在抗日战争中对中国人民的援助(1937—1941)》,莫斯科1965年版,第140—173页。

在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天,即1937年8月22日,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中国红军改编为由三个师(115、120和129师)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开赴山西前线。1938年9月,又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①。

1937年10月,国共两党代表开始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由中共主力开往西北后留在华中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组建新编第四军(为人所知的新四军),由叶挺领导,他的副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新四军部队集中在安徽和江苏省南部(长江以南)和安徽省东部(长江以北)^②。

1937年9月22日,蒋介石允许发表中国共产党7月15日的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就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对报刊作了口头声明。他试图把中国共产党的宣言说成不是两党面对中国有被日本侵吞的威胁而作出的妥协,而说成是共产党人承认自己政策的错误和国民党的正确^③。

中共宣言于1937年9月22日的发表和蒋介石9月23日的声明,是国共两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确立合作的起点。实际上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合法化。中国的统一战线从一开始到随后的整个时期都没有任何组织形式。稍后,在1939年12月,当统一战线已存在两年半时,周恩来就中国统一战线的特点说了以下的话:“中国的民族统一战线,在形式上是没有经过一定的共同纲领,也没有各党的联合组织,就是说在法律上中国的统一战线似乎并不存在。然而事实上,中国的民族统一战线所包含的范围和内容又极其广泛。在抗日战线上,中国各阶级的分子都参加了……”(第84号文件)

国共合作和中国统一战线的另一个特点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自己的军队和自己的领地,诚然,两者的差距是非常大的。例如,当时中国共产党管辖的只有特区(陕甘宁边区)和华南、华中的游击区。

① 见《朱德选集》,北京1983年版,第406页;彭德怀:《元帅回忆录》(中文版《彭德怀自述》),莫斯科1988年版,第307—334页。

② 《中国现代史(1928—1949)》,第150页。

③ 见蒋介石:《抗战与重建:中国抗战六年期间文电(1937—1943)》,纽约1943年英文版,第20—21页。